

麒麟送子 生生不息的生命意义

《易·系辞上》说:“生生谓之易。”“生生”即生生相续,一个生命滋生出另一个生命。生命本身可以新的生命,在新生命中又可滋生出“新的生命”,以至无穷。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寓言故事中,就已经流露出这个思想。愚公对人说,我死了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可以说这是国学所强调的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生命的延续,各位耳熟能详的“麒麟送子”的习俗,以及中国人重视诞生和孕育的习俗,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最为生动的体现。

自从有人类以来,有生必有死,生与死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两大基本主题。远古的人们对于生命从何而来充满神秘而浪漫的想象,“简狄食卵”的神话正是这种想象力的显示之一,而这种想象力的结晶至今还保存在我们某些古老的习俗中。

在中国文化进入成熟的农业文明之后,我们的先人从大自然“春华秋实”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麒麟送子”就是对于生命意义的最好阐释。每逢岁末,城乡家家户户张贴年画、门神以及对联等,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这种习俗在中国农村至今流行。在中国历史上,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的木板年画在全国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桃花坞年画是其中之一。桃花坞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以北,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桃花坞年画的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民间画坛称之为“姑苏版”。这幅传统的麒麟送子图就表现出桃花坞年画精细秀雅的典型艺术风格和工艺特色。传说中,麒麟为仁兽,是吉祥的象征,能为人带来子嗣。相传孔子将生之夕,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上写“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意谓他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此说难以确信,实为“麒麟送子”之本,见载于王充《论衡·定贤》及晋王嘉《拾遗记》。民间有“麒麟儿”、“麟儿”之美称。南北朝时,对聪颖可爱的男孩,人们常呼为“吾家麒麟”。此后“麒麟送子图”之作,作为木板年画,上刻对联“天上麒麟儿,地上状元郎”,以此为佳兆。民间普遍认为,求拜麒麟可以生育得子。唐杜甫《徐卿二子歌》:“君不见徐卿二子多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湖南》引《长治新年纪俗诗》:“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麟麟送子来。”原注:“妇人多年不生育者,每于龙灯到家时,加送封仪,以龙身围绕妇人一次,又将龙身缩短,上骑一小女孩,在堂前行绕一周,谓之麒麟送子。”

在民俗观念中,有“百子”与“贵子”的崇尚观。百子,是对子孙繁衍的“量”的要求,在农耕时代,人丁兴旺是五谷丰登的基本前提;贵子,则代表着对子孙繁衍的“质”的要求,“贵子”之“贵”,不但含有富贵的心愿,还含有社会地位、仁厚品德诸方面的要求。这种心理与观念既来自国学渊源,也有民俗文化的选择、消化、重建与润色,形成更为具体的程式,通过口传的、行为、物化的诸种形式的传承而日益深入人心、广为传播,尤其是当其物化为种种工艺品形态时,它便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绝好形式。所以,我们在看民俗工艺品时,感受到的是民众的国学智慧与乐观精神,其创造展示了一个个富有生命意义的世界,即使像一般的肚兜,满绣着“麒麟送子”之类的花样,是装饰,也是心的写照,流露出美化生活的愿望和乐观的情趣。

新春祭祀 天人合一的哲理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才同一的思想是整体中国人认识自然的核心,《易》把“变”作为宇宙的普遍规律,其变化而产生阴阳,根据阴阳建立六十四卦,在众多复杂多变的事物中,提出“天地人”的重要概念。《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把“天”“地”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气力,而不是西方意义的“神”。天主日月,“日月丽乎天”,证实是自然界的天,而不是虚无飘渺的神道中的“天”。《乾卦·文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系辞》云:“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

民俗的国学价值 ——兼谈春节民俗的国学智慧

◆ 仲富兰

许多喜爱中国民俗的朋友问我,民俗学与国学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认为,民俗学与国学都是传统文化,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民俗是国学传统的显性表征;国学是民俗的价值肌理。由中国大多数民众创造、享用和传习着的民俗文化,它的根脉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民

众的生活继续向前发展和变化。生活中触手可及的衣食住行以及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社会交往乃至个人、家庭、家族、民族的组织运行形式,无不深深地打下了国学印记,并在生动而丰富的国学智慧中得以体现。

今天,我就结合即将到来的传统春节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 麒麟送子年画



▲ 旧时新年风俗“贴鸡”



▲ 新春纳福剪纸

易》以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适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人与自然是和谐的,而不是敌对的。人不是消极地顺从天地之道,而要象天那样“天行健,君子以发奋图强”(《乾卦·象传》)。

大家都知道,民俗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岁时节令,而春节民俗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祭祀。腊月二十四“送灶”,为了怕灶神到天上去说出人间的过失,所以就用糖粘住灶神爷的牙齿,具有戏谑的“贿神”成分,还有腊月二十五俗谓诸佛下降,要扫屋尘,称为“除残”或者“掸尘”;还要祭祀祖先。就是一年到头,将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请到人间,天地人沟通汇集、协调合作,共同对付邪祟一类不好的事物,维护人间的幸福安康,这些构成春节仪式活动最重要的内容。我们还可以从“贴春联”的习俗来思考,可别小看了这一夜之间贴遍千家万户门面的一副副对联,小小对联连接着整个世界,上下两联以配阴阳,虚实对应以配乾坤,举偶对仗,概括天地宇宙,囊括古今人生。小小春联,富贵之家可以锦上添花,贫苦人家顿时蓬荜生辉,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其实,这些习俗形式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与自然相通相依,协调一致,和谐共处,具有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与西方民族的一些节日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民族的节日大抵与人事有关,起源于农耕文明的春节则充分体现中国人对自然的亲近、对生命的关怀和对人情的呼唤。中国人按照自然节律生活劳作、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充分顾及了日月星辰、四季更替、地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社会生活中的传统节日,安排得如此巧妙,是先民们时间意识自觉的产物,是中国人“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具体体现。在春节中我们感悟“天人合一”的观念,增加对人生的内涵和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明心见性,启发德性,明德修身。春节所聚焦的不正是中国传统国学的核心内容吗?!

除旧布新 不变求变的开端意义

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存在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几乎历来的思想家与学者,都强调风俗的变革,要“移风易俗”、“整齐风俗”。他们强调“不有新变,岂能代雄”、“一代有一代的风气”。另一方面,每当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传播,一种新的社会景象或社会风俗风行时,也总有人痛心疾首,“世风日下”、“道德颓丧”。

变与不变成了中国国学传统中长久的纠葛。其实,国学经典的易经就是在说变化,“易”的本义就是变,哪能不变呢?世间万事万物都处于无休止地运动与变化之中。《周易》是一本谈变易的书,同时又谈通,故而谓“通变”。“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变是流通的,通是在变化的万物中包含的永恒、相对不变的因素。《周易》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予以说明:“变通莫大于四时”,四季更替,草木枯荣,一切都在变;但是终则有始,始则有终,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又是不变。这是一种无往不复的通变观。推之于人伦,也复如是,国学传统也讲究变,但更注重在不变中求变。《周易》被置于六经之首,就是要从变易中找出不变的道理。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还是以新春佳节为例,自古以来,人们都强调春节作为一年开端的意义。“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亦曰:‘三始’。”(《尚书大传》)意思是说:正月一日是一年的开端,一月的开端,一日的开端。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说:“正月一日为元日,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意思是说:这一天是新年的开端,新季节的开端,新月份的开端。任何事物的开端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以引发哲学家的无穷遐想。“开端”的意义给予世俗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一种总结过去,期盼、规划和开辟未来时段的当口和节点。春节的全部传统意义都是围绕着“开端”而存在的:宇宙的诞生、万物的起源、文化的建立、新生活的开端。

这可以从春节燃放鞭炮和年初一的“鸡日”习俗的早期含义来理解。现在坊间对于过年燃放鞭炮的解释,是用爆竹之声响吓走“年”的怪兽,赶走怪兽恶鬼,就是驱邪赶祟;另一说是“迎神”,例如年初一欢迎灶神的归来。不论是“赶鬼”还是“迎神”,两种说法,都只是传说而已,而且也只说到了这个习俗“显意识”,比较容易为世人所接受;其深层的意蕴在许多创世神话中有强烈的表达,不为人们所直接认识而已。鞭炮的形状、声响和结果都与混沌神话一致,在宇宙起源的神话中,类似于鸡蛋这样一个封闭体的混沌被打破,天地由此开辟。而竹筒和鞭炮就像混沌一样具有封闭形状;竹筒被烧而炸裂,鞭炮被炸而粉碎,清烟上升而为空气,其他较重物体落而在地,也仿佛混沌初开、天地分离的瞬间。开天辟地,当然是开端的最高象征,燃放鞭炮确实具有实际的象征意义,否则它怎么成为过年开门的第一件事呢!春节的这层开端象征意义还被人们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新人婚礼、新店开张、建房仪式等也燃放鞭炮,这些都是由春节燃放鞭炮引申而来的,都是用放鞭炮象征新事物的诞生。我们再看从南北朝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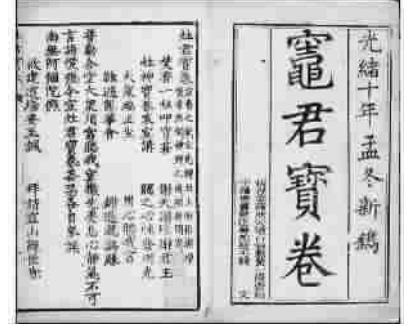
就有的“贴画鸡”习俗,《北齐书·魏收传》引南朝董勋《答问礼俗》:“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入。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有人说主要是“鸡”与“吉”同音,此解释过于简单。其实,在古代神话中有鸡是“重明鸟”的说法,尧时友邦上贡一种重明鸟,能吓退妖魔鬼怪,因为重明鸟样子像鸡,鸡在古代又是“五德之禽”,以后人们就逐步画鸡贴在门上,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金鸡报晓,它守夜而不时时,结束黑暗,迎来光明,也具有开端意义。春节象征着宇宙开辟,万物生长,一切都获得了新生命。这种意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惜随着神话的逐渐消失,春节的这一层象征“万物初生”的意义也逐渐被人淡忘了。

春节除旧布新的开端意义可以给当代人通过一种年底清理的方式,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它给顺利的人更多的梦想,也给许多不顺利的人以希望。尤其是每个人生命的不灭是通过后代来体现的,这也让年老之人努力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有了足够的精神力量。人们把春节的这种开端,作为新的奋斗的起点,说它是个人、家庭、群体乃至民族以及整个国家整个生活节律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是并不过分的。

趋吉避凶 迎春纳福的社会意义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的王安石的《元日》诗描绘了中国人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清代潘荣陛撰《帝京岁时纪胜》记道:“出门迎喜,参药庙,谒影堂,具柬贺节。路遇亲友,则降舆长揖,而祝之曰新禧纳福”。这清人“新禧纳福”四字颇值得仔细回味,“福”是什么?就是讲究平衡与和谐,既要通过合理合法不影响健康的工作得到你没有的,又要珍惜现在已经拥有的,不要得一个,失一个,得失相抵,更不要得不偿失。“福寿康宁”,是符合人性的共同的愿望和追求,它的内涵相当丰富,超越了地域与时空,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人们的追求和奋斗的终极价值,具有广泛的心理认同基础。损人谋福为恶,以诚求福为善,为民造福为贵,就是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别人好,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希望天下苍生都平安、富足、健康、快乐,这是福的境界,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中“仁”的体现,这种“新春纳福”就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是今天我们应该加以弘扬和倡导的。

再说与“纳福”紧紧相随的是“趋吉避凶”的观念,相互拜年时的一句祝福语,哪怕是简单或者省略为“新年快乐”四个字,过年中的种种“口彩”,都反映着一种心理企盼,这就是谋求吉祥、平安、顺遂和成功,避免凶祸、灾难、疾疫和失败,它是怎么也不能归为迷信一类的。“趋吉避凶”是民俗文化中所有事项的核心价值观念,因为它是符合人性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之为人,首先是一种“活着”,或者叫存在,世俗生活中,第一位的任务就是生存、安全,然后要有所成就,实现自我。这是一种人的本能。古时候科学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认识还处于蒙昧阶段,“趋吉避凶”就是先民们一种基本的诉求。人们看到,造物主用自然物和自然力给天下民众带来福祉,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各种资源,同时,也会使人们受苦,洪水、瘟疫、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肆虐对人们的危害极其惨烈,当人们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后,社会力量的压迫有时比大自然的侵扰还要可怕。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国度,老百姓就是风浪中风雨飘摇的一叶孤舟,既无力依靠自身力量取得自然和社会的恩赐,也无力挣脱这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怎么办呢?那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热烈地追求“新春纳福”,小心翼翼地“趋吉避凶”,这就是春节民俗中纳福文化存在的根由。时至今日,人们的日常生活匆忙而功利,许多人精神焦虑而孤独,谁不希望来年“福星高照”、有个好运气?!谁不希望躲避灾祸和病厄呢?!



▲ 光绪年间《灶君宝卷》